



C2012017848



THE SPIRIT OF MAY 4TH

林贤治 著

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漓江出版社



THE SPIRIT OF MAY 4TH

林贤治 著



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C2012017848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之魂/林贤治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407 - 5299 - 6

I. ①五… II. ①林…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②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93.71 ②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019 号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阎海文

封面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69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21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自序

数年前，曾经读到一位西方学者的一段近于史论的文字，说他极其怀念十九世纪，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有创造的、有魅力的人物都出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期。话说得很绝对，颇有“终结”的意味。人们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但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感慨的心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像五四，距今将达一个世纪，便依然引起我的追怀。

认识五四，对我来说最早始于一种文学想象。中学时代，阅读了相当一批五四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曹禺、冰心、冯至，都是我所熟悉的。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两种色彩：一是个人主义的，梦想的，叛逆的，奋斗的；二是人道主义的，爱的，同情的，救助的，二者构成为一代人的独特而迷人的精神气质，英雄主义中夹带着某种先行的孤独与无援的感伤。伍尔夫说道：“1910年左右，人类的性格改变了。”这段话，用于描述当时从传统士人中蜕变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为合适。是他们以松散而一致的思想行动，改变了一个

老大帝国的几千年的沉闷气氛，使之有了一股蓬勃上升的朝气。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片精神荒漠。文学期刊停顿，书架洗劫一空，唯余一种红皮书，雄赳赳地进入每个书店、机关、工厂、学校和家庭。随后，鲁迅著作的单行本相继发行。鲁迅存在的合法性，在当时是一个颇具讽刺喜剧意味的现象。作为一代启蒙思想者的代表，五四精神的实质的体现者，正是鲁迅自由的、人性的、异议的文字，使我在那个充满器声的时日里得以延续梦寻的道路。

至于全面接触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五四史料，则在计划写作《人间鲁迅》的时候。这时，五四，第一次以一个立体的历史性形象重现在我的面前，它那光芒四射的批判精神与奔涌不已的创造活力，使我深受震撼。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它并不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具有广延性，而是飙风一般突然兴起，旋即归于平复。五四的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说，中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只要回顾一下它们在近百年来的命运轨迹，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坎坷不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挑战就直接来自知识界。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它的命运史。我们说俄罗斯精神、德意志精神、法国精神或美国精神，其实都可以通过精神现象的分析，破解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密码。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往往袭用新老国粹派鼓吹的“东方文明”的论调进行定义，而弃置了五四精神的新内容。如何阐释五四？如何看待五四作为一个变异的精神实体的独特性？如何承受五四的精神遗产？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带有学究气味的历史学问题，而是直抵现实核心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因为五四是知识分子运动，而且，这也是由知识分子角色本身，即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分子是民族

的头脑，是变革的先觉者，先天地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者，价值体系的阐释者和批判者。“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英国的一位逻辑学家强调指出，“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不是在思考。”我认同这个说法，要弄清楚五四这个现代化的源头部分，正是一个亟待民主改革的民族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

如果说19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在纪念五四时所做的讨论，还比较切合历史的实际的话，那么，场景置换为1990年代，结论就整个地颠覆过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所遭逢的命运也大致相同。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此后的情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消弭知识分子意识，一方面制造知识分子神话。五四，包括其中的人物，比如鲁迅与胡适，在这里便都成了特别的符码，被倒转的手势，推向一个预设的秩序主义的意义场域之中。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五四之魂》，对五四精神的迁变作过一个粗略的勾描，自觉框架还算合理。某日与朋友谈及知识界，于是起了重印的心思。承蒙广西师大出版社郑纳新先生慨允，便将该文从大象版《自制的海图》中抽出，加上此前发表的《胡风“集团”案》，以及十余篇短文，编成这个集子。

书名取巧用了首篇的题目，副题作“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意在表明全书的一个较为一致的思路，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也确曾注意及此。所谓“史”，明显是夸大的说法，只是借以显示精神演变的一条线索而已。

历史始终使我心存敬畏。

目 录

1

自 序

1

五四之魂

119

五四：没有学者的时代

123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138

自由报人邵飘萍

144

文化遗民陈寅恪

150
“胡风集团”案：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218
存在的见证

225
左右说丁玲

233
巴金的道路

241
读顾准

250
两个顾准

256
再说两个顾准

261
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271
夜读遇罗克

279
再版后记

五四之魂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唯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

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为例。“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龙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太平天国”，作为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毁于一旦，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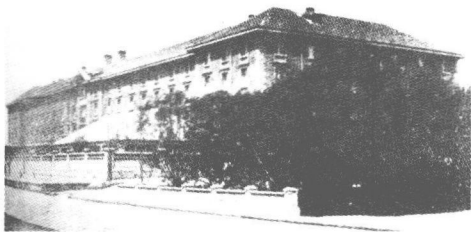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天安门前集会情形。

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一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在1970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戊戌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绝非出于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了。

其实，把五四说成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唯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颀硕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



北京大学红楼

“五四”这名目，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作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是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性转向的表征，而无视于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的“原罪”，“与

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于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黑暗王国里了。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贱；及至1990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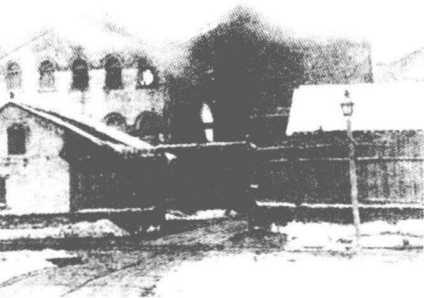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的呼应。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下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

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成了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



洋务派人物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炼铁厂。

革命势在必行。武昌城头枪声乍起，全国随之易帜。一个为转战数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战斗里了。胜利的欢乐十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然为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换了“革命”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带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池，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学医，先后组织兴中会及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继而被迫去职。后又组织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同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作斗争，1925年病逝于北京。遗编有《孙中山选集》等。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1920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不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也入



马克思主义的“乐土”，十九世纪的漫画。全世界的无产者站在这片空旷的岸边，准备登上标志他们的要求的船，领导他们的是马克思。

康有为(1858-1927), 广东南海人, 光绪进士。1895年, 曾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名上书, 拒签《马关条约》, 变法图强。1898年, 促成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 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著作有《大同书》等。



梁启超(1873-1929), 号任公, 广东新会人。与其师康有为一起, 倡导变法维新, 人称“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 坚持立宪保皇思想。辛亥革命后, 曾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及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长。晚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 有《饮冰室文集》等。



严复(1854-1921),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翻译家。字又陵, 又字幾道, 福建侯官(今闽侯)人, 译《天演论》, 号召救亡图存, 在思想界有很大影响。此外, 还翻译了多种西方著作。辛亥革命后, 思想日趋保守。



《天演论》, 1898年出版。



学堂, 然后出洋留学; 既熟读经书, 也通晓西学, 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 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 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 视野开阔, 气质不凡。与此同时,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 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 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清末民初的一代, 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 但正如美国学者史华慈所说, 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 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 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 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依据。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障的生存状态, 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 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 新的同一性; 报纸杂志蜂起, 据胡适保守的说法, 1919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 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 在短短几年内, 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 青年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 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 因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 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

的革命势力，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会以护卫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息。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会。从1919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



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部分刊物。



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



五四时期被北洋政府查封的部分报刊。



《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同年迁至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